

# 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三重历史时空的对话

颜海峰<sup>1</sup> 张丹<sup>2</sup>

(1. 山东政法学院 济南 250014; 2. 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石家庄 050024)

**摘要：**《亨利八世》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历史剧，也是其戏剧创作生涯的压轴之作。莎士比亚于1612年写就此剧，当时正值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退位不久、新王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这与剧中伊丽莎白一世诞生的情节形成历史观照。他以备受争议的都铎王朝第二任国王亨利八世为戏剧原型，依据史料将主要的历史事件加以串联，创作了一部令世人争论不休的作品。《亨利八世》是三重历史时空下的产物，它将历史上的都铎王朝、戏剧中建构的都铎王朝以及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的意识形态融为一体，构建出全新的“真实”历史，使现在与过去得以对话、协商及流通。新历史主义批评将历史与文学文本看作同等地位的独立文本，在文化语境中探讨二者之间的互文关系，从而达到触摸历史“真实”的效果。本文在新历史主义批评视角下，探讨三重历史时空的文本性、《亨利八世》的历史性以及三重时空中历史、文化与文本间的互动关系，旨在对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做出全面解读。

**关键词：**《亨利八世》；新历史主义批评；三重历史时空；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I053；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 (2022) 01-0034-08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01-034.html>

## 引言

莎士比亚一生共创作37部戏剧，历史剧占其总数的三分之一，多达十部。他以历史剧开启其创作生涯，亦以历史剧结束。虽然在当今时代，莎士比亚以其“四大悲剧”及“四大喜剧”闻名于世，但他以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而成的历史剧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学术价值，在莎学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亨利八世》(Henry VIII)创作于1612年，它是莎士比亚执笔的最后一部历史剧，也是其创作生涯的压轴之作。据学者研究表明，《亨利八世》是与其所属“国王剧团”的年轻同事约翰·弗莱彻合作撰写而成。剧中风格迥异的文体特征为这一猜想提供了事实依据。但从其结构来看，《亨利八世》不乏莎士比亚作品晚期的浪漫主义特征。该剧在创作之初，以《全是真事》(All is True)这一剧名问世，后收录于“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当中。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以舞台表现力著称，《亨利八世》也不例外。该剧自问世以来，在各大剧院不断重演，经久不衰。其宏大的舞台场面是其他历史剧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是为什么《亨利八世》虽不是出自莎士比亚一人之手，但仍受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莎士比亚从历史编年史中汲取营养，创作出极具戏剧性的历史剧，从而使历史剧不再停留在单纯讲述历史事件的史实，而是具有戏剧性、观赏性且易于被大众所接受的舞台戏剧。《亨利八世》的故事情节主要取材于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所著的《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编年史》(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莎士比亚从史书中选取适合进行编写的历史情节，加以戏剧化改编。主要手法为，将时间线重新编排，凸显情节的戏剧化效果；或对情节进行虚构化处理，发挥作者的想象力为物增加符合人物形象的语言或行为，以丰富人物性格特点，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特征。《亨利八世》主要由三起历史事件串联而成，即白金汉公爵因“叛国罪”被亨利八世下令处死、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案以及伊丽莎白一世的诞生。这三件事的时间跨度长达20年，莎士比亚将史料的时间线进行压缩，并且对其中的敏感问题进行模糊化处理，使其与官方说法相适应。

莎士比亚与弗莱彻合著的《亨利八世》中涉及了历史的三重时空。第一重是剧中情节真实发生历史时空，即亨利八世在位时期的都铎王朝。亨利八世是都

**作者简介：**颜海峰，男，汉族，山东曲阜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欧美诗歌、典籍英译、文学翻译与批评等。  
张丹，女，汉族，山西吕梁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学翻译。

铎王朝的第二任君主,属英格兰国王亨利七世的次子。他不仅统治英格兰,也是爱尔兰的国王。他在位期间,将威尔士并入英格兰的国土,使王室权力达到顶峰。第二重是作者建构的都铎王朝历史,也是故事情节发生的背景时空。虚构的历史时空是历史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的产物,其中无不透露出作者的意识形态。第三重是作者们所生活的历史时空,即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当时正值伊丽莎白一世女王退位不久,新王詹姆斯一世在位期间。这一时期与《亨利八世》中伊丽莎白女王出生的情节形成历史关照,且在当时的时代中,该剧的演出也具有一定政治意义。这三重历史时空在剧中相互作用、彼此流通,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它将历史看作与文本同等地位的叙事素材,文本则与历史进行相互补充,形成互文。史书不再具有重现历史真实的作用,而与文本一样具有虚构性。因此,新历史主义批评者注重非文学文本的阐释作用,即挖掘逸闻趣事及边缘性事物,将其与文学文本进行相互阐释,从而达到触摸“真实”的效果。

### 一、三重历史时空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者们认为,历史即是一种文本。这里所说的文本并非只有文学文本,也包括非文学文本。文本具有两种功能,一为可阐释性,即具有多方解释的可能性。将历史看作本文,代表了历史不再是一元化历史,而具有多元化特点。历史不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可供人阐述的具有多种可能的文本。二为虚构性,即历史记载的并非真实的历史,历史无法被重现,只能不断接近真实。同时,新历史主义批评强调人的意识形态对历史记载的“篡改”。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录者难免不受当前时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无法记录真实的历史。

#### (一) 都铎王朝历史的文本性

历史是发生于过去的事件。人们想要接触历史,只能通过前人记载的史书略知一二。史书是由人所记录与整理而成,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意识形态。官方机构运用自身权力干涉史书的撰写,使历史记载成为官方权力话语的体现。因此,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话语,这种话语是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表现。研究者可通过对史书的挖掘,从中发现当时历史时代社会风貌的蛛丝马迹,从而对人物及历史进行重新构建,

达到触摸历史“真实”的目的。

历史事件的修编携带着历史编撰者个人的印记,而且是“经过保存和抹杀的复杂微妙的社会化过程的结果”。(Veeser H. Aram, 1989)历史经过官方机构和编撰者的筛选,保留对自身有益的片段,成为官方权力话语的代表。而那些没有被记录的历史只能以野史逸闻的身份流落民间。新历史主义者的任务便是寻找遗落的历史文本,对官方历史叙事进行反抗及颠覆。莎士比亚从《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编年史》中发掘戏剧素材,其行为本身便是将历史看作叙事话语进行提取及改编。

《亨利八世》由三件主要的历史事件构成,其戏剧情节不仅与过去的历史形成观照,而且对当前历史提出反思。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第一任国王亨利七世的次子,他在1509年即位。亨利八世在位期间,虽没有对外发动武力战争,但在比武场等公众场合,给民众留下孔武有力的形象。15世纪末期,威廉姆·卡斯柯顿(William Caxton)翻译了罗曼·鲁尔(Roman Lull)的《骑士制度之书》(Book of the Order of Chivalry),使其在英国境内广泛流通。这本书中提及贵族无聊时通过骑士比武(tournament)打发时间。可以看出,骑士比武是都铎王朝时期贵族间常见的娱乐活动。亨利八世崇尚武力,他以他的父亲为榜样,练就强壮的体魄并习得军事技能。他通过比武场上的胜利来宣告自己同他的父亲一样,即通过武力合法取得王位。(Richardson, 2013)关于国王的比武场景,霍尔在其书中写到,在1510年的五旬节(Pentecoste)上,亨利八世在格林威治的宫殿举行庆祝活动。他向在场的来宾发起挑战,比武过程中表现得十分优异,“国王强健的体魄和强悍的力量获得了无数的赞美,赢得了荣耀”。(Edward Hall, 1809)除此之外,亨利八世在离婚案之前,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教徒。1521年,亨利八世组织了一批神学家,以自己的名义撰写了一本《保卫七项圣礼》(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um)表明自己对罗马教廷的支持以及捍卫信仰的姿态。(赵博文, 2017)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一案对当时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权力的分配。1509年,达德利在《共和国之树》中谈及婚姻对国家统治的重要性,“如果一位君王能够洁身自好,并且对他的妻子或者王后保持忠诚,那么上帝将会赐予君王无比美好的事物,让他获得

荣耀和美德，并且会在天堂中给他加冕，赐予他一位继承人，爱德华。”（Edmund, 1948）由此可知，在都铎王朝时期，婚姻和后嗣是维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因此，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民众对新王后也赞誉有加。“她出类拔萃，品貌双全，我相信，从她的身上许多福祉定会降临此土，而此土也定会因此而被铭记”。（《亨利八世》，三幕二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相互补充，完善了正史中遗漏的部分，从而构建完整的都铎王朝历史。都铎王朝的历史文本是展现时代社会风貌的有效途径，也是历史文本性的体现。

## （二）戏剧建构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历史的文本性”在于，历史事件是以“经过语言凝聚、置换、象征以及与文本生成有关的亮度修改的历史描述的面目出现”。（Veesser H. Aram, 1989）《亨利八世》作为文学文本，其本身的虚构性不言而喻。莎士比亚运用戏剧化的语言将历史事件加以改编，丰富了历史人物的形象与性格特点，为观众展现了亨利八世及凯瑟琳等人物的鲜活形象，对构建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亨利八世》中的第二重时空，即莎士比亚与弗莱彻共同构建的戏剧内的都铎王朝历史时空，其同样具有文本性特征。“蒙特洛斯将历史视为一种文化系统（社会历史文化相互联系与作用的总和），而文学文本则是这种形式的表现”。（李圣传，2020）《亨利八世》以都铎王朝的历史史料为基础，构建出文学文本内部的历史时空。观众能够从作者所构建的时空中找出相应的文化痕迹，从而补充史书中缺失的部分。该剧以三件历史事件为主体，用戏剧化手法将其串联成剧。其情节编排具有一定的逻辑性，从而体现其合理之处。该剧开篇讲述白金汉公爵惨遭诬陷而被亨利八世赐死的情节，从而为后续情节做铺垫。这一情节不仅表现了白金汉公爵光明磊落的形象特点，并以此反衬沃尔西主教的阴险卑鄙。沃尔西先是在亨利八世面前进献谗言，并指使公爵的前管家对其进行诬告，“他惯常之举——也是每天他必谈之事——就是如果国王无嗣驾崩，他要设法取得王杖”。（一幕二场）亨利八世由此怀疑白金汉的忠心，“日月天光之下，他堪称是最大的奸佞”。（同上）白金汉因“叛国罪”被处以死刑，临刑前的遗言表明他的清白和无畏，“我

今天被宣判犯了叛国罪，将以此名义受死；但是上苍为证，如果我对国家不忠，在断头的厉斧落下时，就让我良心把我毁灭吧，如果我良心尚存的话”。“代我向国王致意，如果他谈及白金汉，请告诉他，您见我天国之路已走了一半，我依然为国王祝愿，为国王祈福，直到我灵魂离体”。（二幕一场）白金汉的遗言中只有对国王的忠心和祝愿，并无怨恨与诅咒。这一幕似乎将亨利八世定位成一个易于听信谗言的国王，但在随后的离婚案中，却无不显示亨利八世的权谋心机。亨利八世察觉教会法庭不同意其与凯瑟琳离婚，不惜解散教会法庭，另立国教，将权力全部收归自己所有。他派人搜集沃尔西罪证，将其免职并没收其财产，随后扶持克兰麦上台接管教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克兰麦在法庭受审时，他拿出国王的戒指并成功脱罪。正如亨利八世告诉他的一样，“如果你的恳辩他们不理，就把这枚戒指给他们，要求由朕来判处”。（五幕一场）由此可见，国王的权力凌驾法庭之上，国王的命令即是法律。

《亨利八世》中构建的历史时空凸显了国王的权力之大。该剧以史实为基础所创作的情节，加以戏剧化改编，集中反映了白金汉公爵的忠心和沃尔西的奸诈，同时表现了亨利八世善于权谋、工于心计的性格特点。莎士比亚构建的历史时空充分体现了其文本性特征，说明了历史即为叙事，可由文字进行不断阐释，并构建新的历史。

## （三）詹姆斯一世时期历史的文本性

《亨利八世》中除了含有都铎王朝的历史时空以及文本中构建的历史时空之外，还有一层隐含的时空，即莎士比亚所处历史时期。莎士比亚经历了两任君主的统治时期，即伊丽莎白一世以及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与剧中伊丽莎白一世的诞生形成历史关照。虽然莎士比亚与弗莱彻依据史料创作了《亨利八世》，但在创作过程中，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加入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创作者意识形态的摄入是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的区别之一。“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方式必然有其新的切入口、新的视角，新历史主义又将语言碎片拼贴起来，标上印记再送入网站，和其他文化现象、政治模式、社会意识形态等进行超文本的链接。”（吾文泉，2002）每个人的意识形态都不尽相同，原因在于其成长过程中所受教育、培养方式、个人经历等各不



相同。影响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国家政治制度。国家所运行的政治机制及宣传的主流意识形态表现了其权力机制对公民的规约，直接塑造了公民的思维方式及三观价值。国家政治机构的权力运行对人的规约作用是新历史主义强调的另一重点。新历史主义者将历史与文学放置于同等地位，考虑其内在的联系与互动。他们“把美学的传统铭刻在文本上，突出政治权力的力量以彰显文学和社会秩序所包含的边缘性部分，并使二者的关系能够协调一致”。（朱安博，2008）边缘性文本也是阐释文学文本及历史文本的重要材料，甚至对阐释结果具有颠覆性作用。因此，将历史看作一种历史叙事文本，并与文学文本及非文学文本进行相互阐释，是新历史主义的“新”意之处。

亨利八世与王后凯瑟琳的离婚案与1613年的一起离婚案关系密切，其直接推动了《亨利八世》的问世。从当年五六月份的私人信件中可以了解到，艾塞克斯伯爵和他年轻的妻子埃塞克斯女爵弗朗西斯·霍华德的离婚案引发社会热议。（贾士衡，1987）原因在于涉案女性为宫廷内务大臣之女，且传言为国王的宠臣罗彻斯特的情人。这起案件为判决婚姻无效提供了先例，甚至法庭委员长艾伯特大主教表示：“只要这个案件一判，每个和他妻子关系冷淡的男人，每个和她丈夫关系冷淡的妻子，都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成群结队地到我这里来办理无效的证明”。（Thomas, 1809）可见，当时这起离婚案对法律及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但是，这起离婚案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政治目的。弗朗西斯·霍华德的家族为把倾向新教的国王拉入天主教阵营，借婚姻无效的名义拉拢国王的宠臣罗彻斯特，最终“把国王拉入这个集团”。（Weldon, 1650）萨福克作为宫廷内务大臣，负责检查宫廷供应问题。这让靠王室庇护的国王剧团遭受政治牵连，他们意识到必须创作一部触及这起离婚案的戏剧来进行反击。于是，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离婚案成为其首选素材。

通过对信件等非文学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亨利八世》是一部在政治推动力下产生的戏剧。它充满了作者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目的，充分体现了文学文本创作者的主体性。在这部戏剧中，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创作者根据自己的目的对历史进行改编，从而使作品适应当时历史的社会进程，反映了詹姆斯

一世统治时期的文本性特征。

## 二、《亨利八世》中的历史性

历史剧之所以为历史剧，因其根据历史事件改编而成。历史剧中最不容忽视的便是其浓厚的历史底蕴。因此，通过分析历史剧中的历史因素，可丰富其文学文本的深刻现实意义。同时，历史剧的文学性也为其历史提供审美效果。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艺术是历史，作为历史，全是在作品中真理的创造性保存……艺术作为发现，本质上是历史的”。（1991）可以看出，历史与文学不可割裂的关系。

### （一）作为文学文本的历史性

莎士比亚最初在创作历史剧时，是以舞台表演及现场观众体验为准。但其戏剧丰富的文学性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将其推向文学圣坛。莎士比亚的戏剧通过了时间的考验，成为文学经典受世人推崇。他的历史剧之所以优于其他人的历史剧，原因在于他将社会中的权力斗争搬上了舞台。历史上的争权夺利及人性弱点在他的戏剧中都能充分体现。由此看来，作为历史剧的《亨利八世》其中也必然包括历史上的权力斗争等现实因素。在这里，“文本拥有历史的和文学的双重身份，历史可以被想象成偶然性的一部分”。（张进，2002）历史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抽象事物，而是可以供人猜想与阐释的具体文本。

《亨利八世》作为文学文本而言，强调的是其文学性。它的文学性主要体现于其打乱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按戏剧情节进行重新编排而凸显的文学特征。历史事件仍是其中主要叙说的部分，但人物的言行却极大部分含有作者的杜撰。历史上人物的言行与剧中是否一致，这已无从考证，只能通过一些史料的记载加以补充。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莫过于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离婚案。这一事件是都铎王朝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剧中，亨利八世自称与凯瑟琳离婚是因“她的胎儿要么未生先亡，要么产后早夭”。（二幕四场）他认为“此乃上天之遣”，他无法享受“由世间最佳的子嗣”继承的王国。但实际上，在离婚之前，亨利八世已对王后的侍女安妮“一见倾心”。宫内大臣见过安妮后也发出“也许这位女士将产下贵嗣，让全英伦岛生辉”的感慨。（同上）亨利八世的表现与宫内大臣的言论暗示了离婚案的结果。史料中的记载为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离婚案进行

了补充。阿拉贡的凯瑟琳作为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女儿，在1501年的政治联姻中嫁给了亨利七世的长子亚瑟。但好景不长，亚瑟在婚后四个月便死于疾病。亨利七世欲维系与西班牙的同盟关系，欲说服凯瑟琳嫁给次子亨利。同时，凯瑟琳的巨额嫁妆也让英国王室不愿其离开。（Edward, 1809）在凯瑟琳母亲伊莎贝拉的斡旋下，教廷宣布凯瑟琳与亚瑟的婚姻无效，从而使其与亨利八世的婚姻合法化。亨利八世从谋划离婚案起至其结束持续了八年之久，英国权力的归属也因这起离婚案发生了变化。离婚案的背后是教廷权力的运作，亨利八世察觉到了对其不利因素，最终解散教会，另立国教，成为教会和国家的首脑。《亨利八世》的戏剧情节取材于史料，对历史事件进行了美化与加工。但通过史料的补充，剧中的文学性与历史性产生了互动的效果。

《亨利八世》是历史产物的一部分，它参与了历史的发生与发展，甚至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该剧作为文学作品的同时，其历史性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 （二）作为文化文本的历史性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蒙特洛斯“将历史视为一种文化系统（社会历史文化相互联系与作用的总和），而文学文本则是这种形式的表现。”（李圣传，2020）《亨利八世》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反映了都铎王朝时期的社会风貌，另一方面展现了人的生活轨迹，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分。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途径之一，也是反观当时生活的一面镜子。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归根结底在于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亨利八世》描述了都铎王朝时期的历史事件，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当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风貌。亨利八世与天主教会前后的关系变化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走向。亨利八世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位初期与天主教会关系密切。他不仅每天做弥撒，而且为了获得教会支持严厉打击异教徒。教会为表明态度，曾在亨利七世与亨利八世在位期间三次赠送金色玫瑰，代表两者交好的关系。（Richard, 2006）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之时，亨利八世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当众焚烧路德的著作，表明自己的立场。即使亨利八世深陷离婚案当中，发现民众纷纷撰

写小册子抨击天主教会时，他也不忘镇压。1530年，他颁布了一条王室法令，其中将那些反对天主教的小册子定为“将英国人民引离正确的天主教和上帝的信仰，并且煽动他们暴乱，不服从他们的君主，同时令他们远离所有的法律，良好的品行，并且最终将这个伟大高贵的国家带向覆灭”的异端书籍。（Hughes & Larkin, 1964）亨利八世对天主教的虔诚态度决定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宗教信仰，整个社会呈现出天主教独占鳌头的局面。直到亨利八世通过议会单方面宣布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为止，天主教才被亨利八世自立的英国国教所取代。而这一切皆因权力的归属问题而起。亨利八世不仅想要成为国家的领袖，也欲成为民众的精神领袖。他在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写道：“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坚信，受到《圣经》的鼓舞，我们的内心充满热情，来重建信仰，重现基督教真正的辉煌，上帝的意志应该得到纯粹的，真正的贯彻”。（Wooding, 2009）他从《圣经》中寻找依据，为王权干涉教权提供事实佐证。教会对亨利八世离婚案的染指促成了其重建信仰的决心。他先后出台《禁止上诉法案》《继承法案》以及《至尊法案》等一系列的法令，形成“至尊王权”的思想。《禁止上诉法案》中提到：“英格兰帝国被一位帝王所统领，国家内的所有人无论是世俗民众还是教职人员，都要服从国王的意志，因为国王的意志仅次于上帝”。法案中明确规定实施王权的所受范围包括普通民众与教职人员，确立国王意志凌驾教会的思想。自此以后，国家权力收归国王所有，教会不再拥有权力。教会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甚至其本身也为国王所有。信仰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其转变的同时决定了文化的转向。文化所有的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改变。

《亨利八世》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在历史与文本之间得以补充，从而丰富了文化本身在历史与文本中的作用。历史作为文本活动的场所，同时，文本也是“活动中的文化”。（查尔斯·E·布莱斯勒，2015）

## 三、三重时空中历史、文本与文化的互动

新历史主义将文本的含义加以扩充，认为文本包括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其中，非文学文本隐含了可以颠覆官方叙事的巨大能量，它们常常以碎片化的文本形式出现。因此，新历史主义者的任务便是将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碎片化文本加以串联，形成可对文

学文本意义进行阐释的突破口。历史记载也具有同等性质。历史记载是经过史学家多次“篡改”后形成的叙事文本,其具有与文学文本相似的虚构性特征。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共同作用,形成文化文本的表征,共同构成文化系统。《亨利八世》中所隐含的三重历史时空在剧中交相辉映,不分彼此。历史、文本与文化三者在剧中处于动态平衡的关系,密切联系。

### (一) 历史与文化的互动

历史是发生于过去时间的事件组成,是包含各种文化因素的统称。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小历史”所组成,并以文本形式散落在各种非文学文本之中。这些碎片化的历史文本在文化系统中相互作用,形成作用力场,展现各自的活跃力量。文学文本对社会及文化进行还原,得以“深入揭示文学文本的文化生成机制”。(黄小伟,2007)历史与文化如何形成互动,取决于历史与文化的本质属性。文化内容广泛,通常被看作历史与文本产生关联的场所。文化决定人类社会将会形成怎样的历史,也决定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主要内容。《亨利八世》中的三重历史时空决定了其三重文化的交织。

由于新历史主义着重考察的是“历史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中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金永兵,2019)因此,探寻文化语境中历史与文本的相互作用以及三者之间互为影响的联系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路径。《亨利八世》的第一重历史时空为都铎王朝时期。该剧将发生于当时的三件历史事件加以戏剧化改编,呈现出与史料相似但不相同的事件走向。其中,困扰西方多年的教权与王权的争夺问题在亨利八世在位时期得以解决。教权强于王权的局面使亨利八世的离婚案迟迟不能解决。正是这起案件让亨利八世意识到教权对王权的威胁。《亨利八世》的第二重历史时空为历史事件进行了戏剧化补充。在不改变原本事件的前提下,对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重新编排,使之更符合戏剧情节的走向。亨利八世察觉教会在故意拖延对离婚案的判决时,决定对教会进行整治。“朕可以看出,这帮红衣主教们在愚弄朕;朕厌恶罗马的拖延懒散、阴谋诡计”。(二幕四场)历史上亨利八世的离婚案拖延了八年之久才得以解决,而在剧中以一幕的时间对其进行压缩。对历史时间进行压缩及情节上的改动是文学的历史性与虚构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亨利八世》

的第三重时空是莎士比亚所处时期。《亨利八世》中“婚姻无效”的案例成了影射现实事件的文本工具。莎士比亚所处时期正值新王登基,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的时期。由于王室成员间的权力斗争,引发了另一起“婚姻无效”的离婚案例。这起事件牵涉到了莎士比亚国王剧团的利益,于是《亨利八世》应运而生。剧中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的离婚案影射了当时的现实情况,为后世理解这部剧提供了新的角度。

无论是都铎王朝的历史、戏剧中构建的历史还是莎士比亚生活的历史,亨利八世离婚案这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历史时空中都隐含了各自的权力运作。离婚案在现实中或在戏剧中,扮演的只是一个引导读者进行深层次解读的入口。历史与文化的互动在文本中得以展现,文化得以通过历史与文本表现暂时的真实。

### (二) 历史与文本的互动

历史观与文本观是新历史主义者关注的两个角度。历史与文本无论何时都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历史作为一种叙事话语,其本身就具有文本性。文本是历史现实的反映,也在不断重构历史。历史通过文本变得更为丰富,文本也因历史更具现实特性。历史与文本的互动是新历史主义批评所主张的一对基本动态平衡观念,其在《亨利八世》的三重历史时空中表现明显。

在《亨利八世》的三重历史时空中,都铎王朝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在文学文本中得以重现,但也因此表现了其历史虚构性特征。创作者的主体性地位在文本中凸显出来,使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性加以放大。都铎王朝的历史通过史书记载而成。在史学家进行历史考证时参考了当时的历史文献,从而史书的撰写经多人意识形态而成,或多或少带有编撰者本身的思想观念。因此,史书本身作为一种语言文本,具备了文学文本虚构性的特点。戏剧中所建构的都铎王朝历史是其历史的重构,也是对其官方历史的颠覆与补充。文学文本通过戏剧化手法呈现,带入作者的主观意识形态,与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当代的对话,从而与史料一同丰富历史文本,不断重构历史。文学文本的虚构性特征为历史提供了人物的性格特点与情感表达,使历史人物更为鲜活。例如在《亨利八世》中,王后凯瑟琳对亨利八世而言拥有“罕有的品性、可人的柔婉、圣徒般的温良、母仪天下的风范、不失威仪的服从,以及其他崇高虔诚的品质”。(二幕四场)凯瑟琳可



谓完美的品质在亨利八世讲来无不“痛苦压抑，汗水涔涔”。无论亨利八世是虚情假意还是真心实意，读者在阅读时能够感受到人物内心的挣扎和无奈。文学中的情感表达为历史人物提供了感情基础，从而焕发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放眼莎士比亚所处时期，当时王室的离婚案为《亨利八世》提供了创作灵感，并在史料中寻得了相似案件。历史史料与文学文本的结合促成了该剧历史性与文本性的交互融合，从而与史料一同构建了历史。

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的产物”，其事实“是被语言描述所建造的”。（海登·怀特，1993）历史与文学文本共同作用，从而显露隐含在《亨利八世》中的三重历史时空，使文学文本在历史与文本之间来回穿梭，阐释历史。

### （三）文化与文本的互动

新历史主义批评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盛行时期，力图从其“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消失；主体性丧失，距离感消失”（王岳川，1992）的倾向中开辟一条与历史相联系的批评路径。文艺复兴时期处于“横跨中世纪僵化静止的自我形象与现代自由人文主义自我塑形之间的‘过渡时代’，这一前工业社会的人的最后避难所，引起了后工业时代的学者的广泛兴趣”。（王岳川，1997）文艺复兴时期成了当代理论思潮的关注对象。新历史主义批评是回归历史的批评，它与旧历史主义一元，静止的历史观不同。新历史主义批评将历史与文学置于平等地位，将两者看作文本的表现形式，在文化语境中形成互文关系。简而言之，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共同形成文化系统，并在文化这一多重所指的场域中寻求彼此的联系。

《亨利八世》中隐含的三重历史时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时代文化。首先，都铎王朝成就了王权一统的历史局面，为后世英国的政治制度与社会风貌奠定了历史基础。社会政治局面的改变使当时的文化风向发生转变。英国社会不再以教会权力为导向，国王的婚姻问题也无需向教会征求同意。亨利八世开创了“王权至尊”的历史局面，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与精神领袖。在此期间，社会上的文本与非文本无不围绕亨利八世的绝对王权展开，其主导了文化的走向。其次，戏剧作为历史的产物，同样充斥着王权一统的现实。亨利八世与萨福克的一次谈话中，表明了国王权力对

臣子的压制性作用。“朕心不在焉，非你对手”，“只要朕全神贯注，你就落败了”。（五幕一场）亨利八世对自己权力的自信在与臣子的对话中得以表现。即使有输给臣子的时候，那也只是因为自己心不在焉，而不是权力的丧失。他只要认真对待，就一定会赢。由此可知，不论是他听信沃尔西的谗言将白金汉处死，还是他以国王的权力没收沃尔西的财产，都是他权力运作的结果。权力的斗争通过戏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文本与历史的结合在戏剧中得以展现。最后，历史剧中的内容与作者的时代产生历史关照。在莎士比亚所处时代中，亨利八世的离婚案的场景犹如历史的巧合一般在当时发生。王室成员再度使用“婚姻无效”的方式争权夺利，与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形成历史的互文。也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亨利八世》应运而生。一方面，该剧是为影射当时的离婚事件，推动这起事件的发展。另一方面，作者借用亨利八世的离婚案提醒观众，与之类似的离婚事件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其中充斥着权力的斗争。

文学文本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权力运作。文学文本与历史事件形成历史关照，在文化语境中共同作用，推动历史进程的发展。《亨利八世》中的三重历史时空文本相互观照与阐释，建构出符合当时历史语境的历史事实，为文学文本的解读开辟了新的视角。

### 结语

莎士比亚的戏剧经久不衰，并成为文学理论的试验场，是因“人们总能在莎士比亚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关心的事情”。（Levin, 1986）新历史主义在历史主义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本进行有机结合，使文学文本跳出历史框架，在不同文本类型中寻找可供阐释的突破口。历史在文学文本中不再充当背景的角色，而是与文本进行平等对话的历史文本，其与文本相互阐释，重构历史。历史不是既定的事实，而是编撰者几经“篡改”的产物。其中随处可见编撰者意识形态的痕迹，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亨利八世》的三重历史时空中隐含着历史、文本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不论是史料中的都铎王朝还是戏剧中建构的历史，都与作者身处的时代环境形成历史关照。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文本性特征，文学文本也富含历史性因素。二者在文化语境中进行相互作用，最终达到历史、文本及文化的动

态平衡。

### 参考文献

- [1]Anthony Weldon. "The Court and Character of King James (1650)" . Walter Scott, ed., *Secret History of the Court of James the First*[M]. Edinburgh: J. Ballantyne, 1811.
- [2]Edmund Dudley. *The Tree of Commonwealth*[M]. ed. D. M. Brodie, Cambridge, 1948.
- [3]Hall Edward. *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re and Yorke*[M]. ed. J. Johnson, 1809.
- [4]Richardson Gleen. *The Field of Cloth of Gold*[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5]H. Aram Veaser (Ed.). *The New Historicism*[M].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6]Hughes and Larkin. *Tudor Royal Proclamations Vol. II* [M].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64.
- [7]Levin, Harry. "Critical Approaches to Shakespeare from 1660 to 1904"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 Studies*[M]. Ed. Stanley Well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6.
- [8]Lucy Wooding. *Henry VIII* [M]. London: Routledge, 2009.
- [9]Rex Richard. *Henry VIII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M]. Palgrave, 2006.
- [10]Howell, Thomas B. ed. *Cobbett'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State Trails II* [M]. London: R. Bagshaw, 1809.
- [11]查尔斯·E·布莱斯勒. 文学批评: 理论与实践导论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 [12]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 彭富春译. [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 [13]海登·怀特. 评新历史主义 [A]. 张京媛主编.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14]黄小伟.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实践及其文化功能运作 [J]. 社会科学家, 2007 (3): 33-35.
- [15]贾士骅译. 英国史 (上) [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7.
- [16]金永兵. 论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旨趣及其文化影响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4): 69-77.
- [17]李圣传. 实践“新历史主义”: 格林布拉特及其同伴们 [J]. 学术研究, 2020 (2): 169-176+178.
- [18]王岳川. 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 (代序) [A]. 王岳川, 尚水.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 [19]王岳川.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社版), 1997 (3): 23-31+159.
- [20]吾文泉. 莎士比亚: 语言与艺术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2.
- [21]张进. 论新历史主义的逸闻主义 [J]. 兰州大学学报, 2002 (2): 21-28.
- [22]赵博文. 亨利八世王权形象塑造研究 [D]. 武汉大学, 2017.
- [23]朱安博.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莎学研究的新历史主义视角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 (05): 39-43.

## Shakespeare's *Henry VIII*: A Dialogue in Three Historical Spaces

Yan Haifeng Zhang Dan

**Abstract:** *Henry VIII* is the last historical play written by Shakespeare, and also the final work of his career. Shakespeare wrote the play in 1612 when the abdication of Queen Elizabeth I and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new King James I,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birth of Elizabeth I in the play. Based on the controversial King *Henry VIII*, the second king of Tudor, Shakespeare has created a controversial work that links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with historical sources. *Henry VIII* is the product of three historical times and Spaces. It integrates the Tudor in history, the Tudor in drama and the ideology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and constructs a new "real" history, which enables the dialogue, negoti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The new historicism criticism regards history and literary texts as independent texts of equal status, discusses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and achieves the effect of touching the "reality"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historicism criticis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xtuality of the three historical spaces, the historicity of *Henry VIII*,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 in the three historical spaces, aiming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s *Henry VIII*.

**Key words:** *Henry VIII*; new historicism criticism; three historical spac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